



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柳宗元政治评价之论析

An Analysis of Wang Anshi and Sima Guang's Political Evaluation
of Liu Zongyuan

黄慧婷

WONG WAI TENG

19ALB0019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1



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柳宗元政治评价之论析

An Analysis of Wang Anshi and Sima Guang's Political Evaluation
of Liu Zongyuan

黄慧婷

WONG WAI TENG

19ALB0019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1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成果	2
第三节 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3
第四节 研究难题/预计成果	4
第二章 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	5
第一节 “天下之奇才也”	5
第二节 王安石坚持不懈的改革精神	9
第三章 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	12
第一节 “王叔文党”	12
第二节 对柳宗元人品的赞赏	15
第四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交锋”	19
第一节 王安石讽刺司马光“与世俯仰的小人”	19

第二节 司马光讽刺王安石“扰民”	23
结语	28
参考文献	29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黄慧婷 WONG WAI TENG

学号：19ALB00194

日期：2021 年 11 月 26 日

论文题目：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柳宗元政治评价之论析 An Analysis of Wang Anshi and Sima Guang's Political Evaluation of Liu Zongyuan

学生姓名：黄慧婷

指导老师：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王安石（1021-1086）与司马光（1019-1086）二人对唐代曾经参与过“顺宗新政”的柳宗元（773-819）的政治评价有所不同。王安石在认为柳宗元只是被王叔文所牵连，肯定了柳宗元的政治才能；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将柳宗元称之为“王叔文党”，可见是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是保持负面的态度。然，王安石与司马光除了是对柳宗元的文学与政治进行了评价，实际上他们是借助了评价柳宗元之名与政见不合的对方进行了“交锋”与“讽刺”。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除了同情柳宗元的遭遇，同时还讽刺反对新法的人是“与世俯仰的小人”，对司马光等人进行了评击；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节录的《梓人传》与《种树郭橐驼传》，这两篇传记散文虽有表达出为相之道与养民之道，实际上两篇散文中有浓厚的讽刺意喻，分别是讽刺奸相与讽刺官吏“扰民”行为，因此司马光借此对王安石进行了讽刺。

【关键词】：王安石、司马光、柳宗元、顺宗新政、熙宁变法

致谢

大学生涯一眨眼便来到了尾声，当初刚入学时期的心情和点点滴滴都依旧历历在目，原来老师真的没有撒谎，大学三年真的转瞬即逝。如今毕业论文也已经顺利完成，首先我要非常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余厝雄老师。感谢老师在当初我对论文题目感到迷茫的时候给予我意见，而在后来的撰写论文期间，对我的初稿仔细地进行批改，很有耐心地指正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并且还不断地提供我许多与论文题目有关的书籍让我阅读，谢谢您老师。

另外，我特别想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在大学实体上课了一年后便爆发了新冠疫情，我也回了家上网课了两年的时间。谢谢母亲并没有嫌弃我这个一直呆在家里的“大米虫”，在我上课与呈现报告等等时都会给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学习。在撰写论文期间我很容易焦虑，母亲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到我的情绪，并给予我鼓励和安慰，有时候还会煮上我喜欢吃的菜肴安慰我，让我继续加油。还有我的姐姐，虽然她如今在外工作，但都会经常信息我让我好好加油，对我关怀备至。家人对我的鼓励，是让我坚持完成论文的主要原因。

此外，我还要感谢与我一起念书的大学朋友们，我们同窗三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路以来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但都互相扶持，坚持到了大学最后一年，一起撰写论文。期间，大家都会因为课业和论文而经常焦虑和不安，但我们都会照顾彼此的情绪，试着缓和和调解气氛，互相鼓励，一句“今晚看月亮吗？”只为博君一笑。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这大学三年来很有趣很难忘。

最后，我想要感谢两位特别的人，虽然我们素未谋面，远在天边却贴在心间，谢谢他们在我撰写论文期间成了我的一束光，教导我行胜于言，希望在未来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人。

第一章：绪论

本文的题目为《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柳宗元政治评价之论析》，本文将会以王安石以及司马光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去论析他们对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评价中有何目的与意义。

第一节：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王安石（1021-1086）与司马光（1019-1086）是北宋时期新旧党派之争的重要人物。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开始推行了一场目的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以及“富国强兵养民”的政治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变法中包括青苗法、市易法、三舍法等等。然而这一场新法遭受到了一片反对声浪，导致朝堂上逐渐分裂成支持新法派以及反对新法派，两个党派常年争执不休，两边也都毫不退让。其中司马光便是反对派之首，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阻止变法，不仅上书弹劾王安石，还三书王安石，写得动之以情，希望能以昔日同僚之情成功说服王安石罢免新法。

对于柳宗元的政治评价，王安石与司马光持着不一样的意见。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认为柳宗元是被王叔文“所诱”才“陷入不义”，并且称赞柳宗元“天下之奇才也”，虽然否定了“顺宗新政”的政治运动但肯定了柳宗元的政治品格；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贞元十九年》中记载了王叔文集团以及“顺宗新政”的始末，并称柳宗元等人为“王叔文党”，可见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是的基础是在王叔文集团上，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保持着批评的态度。

一位是推行新法的主要人物，一位是反对新法的首领，两人对这场新法的态度与立场完全处于一个对立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对新法的态度中，是否会影响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曾经参与过“顺宗新政”的柳宗元的评价？因此，本文将会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对柳宗元的文学与政治评价中，是否也体现出了

他们本身对“熙宁变法”的态度，以及他们是否有意地协助了对柳宗元的评价与对方进行了“交锋”或是讽刺了对方。

第二节：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成果

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生平与政治事迹拥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元代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和南宋李焘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中记载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生平事迹以及概括了他们的一生事迹，可让后人对两位的生平作一个快速的了解。《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效仿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全本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记载了北宋 167 年的史事，当中更是详细记载了北宋时期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新旧党派之争所发生的经过与过程，可让后人对当时的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而司马光的著作《资治通鉴》也是本文主要的参考书籍之一，因为当中会反映出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评价，以及司马光本身对“熙宁变法”的态度。

有关今人对王安石研究著作包括张祥浩，魏福明等著《王安石评传》、李华瑞著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梁启超著《王安石传》、高克勤著《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范文汲《一代名臣王安石》等等；而有关司马光的今人著作包括李昌宪著《司马光评传》、王德保著《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赵冬梅著《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等等。另，王安石和诗文集研究当中包括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高克勤撰《王安石诗文选评》、吕晴飞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曲德来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 新注 集评》、萧庆伟著《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等等；而司马光则有李文泽和霞绍晖所校点的《司马光集》等等。

因为本文会论述到有关熙宁间新、旧党派的纷争，因此本文将会引用有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在新法面前对新法的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在《王安石评传》、《司马光评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等等的书籍都会有讨论与研究。对于论文与期刊，在对王安石和司马光因为新法的分歧也有研究，如魏春初〈浅析司马光的变革理论与王安石的分歧〉、李向伟与刘双〈也谈司马光和王安石变法〉等等，都有对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的探

讨。而有关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柳宗元评价的研究不多，其中一篇是莫道才的硕士论文〈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论文中对宋人对柳宗元在政治上和文学创作上进行了探讨和论析，研究的宋人当中也包括了王安石与司马光，还有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等。

第三节：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本文将会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作为主要的视角与脉络，去探讨和分析他们二人对柳宗元的评价有何区别，并且分析他们对柳宗元评价的原因是什么。所以第二章主要是探讨王安石对于柳宗元的政治主张的评价，以及在这些评价中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因此此章节将会分别讨论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本文会将王安石评价过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进行详细的分析，当中包括了《读〈柳宗元传〉》以及《上人书》。虽然王安石对柳宗元的评价只有这两篇散文，但散文中所要表达的内容除了是对柳宗元的评价以外，其实还能体现出其他的目的与意义。

而对于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与文学评价也是需要去探讨。第三章主要是以司马光为主，探讨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评价。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评价主要是在《资治通鉴》中寻找一二，有关柳宗元的记载分别在《资治通鉴·唐纪·贞元十九年》、《资治通鉴·唐纪·永贞元年》以及《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因此本文将会讨论司马光在撰写对王叔文集团的用词与用语，去论析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评价。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节录了柳宗元的两篇传记散文，分别是《梓人传》与《种树郭橐驼传》，并还认为“此其文之有理者也。”因此本文将会讨论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以及中心思想，试着探讨出司马光将其二文节录在《资治通鉴》中的原因。

第三章中主要是探讨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否有，以及如何借助评价柳宗元来与对方进行“交锋”和讽刺。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批评那些随波逐流、对理想有始无终的小人，那么王安石是讽刺那些批评柳宗元的人，还是说王安石在批评那些反对王安石新法，只懂得因循守旧，喜静厌动的反对派呢？而司马光身为反对派之首，王安石是否在对司马光进行批评？而司马光用了毕生心血去完成的《资治通鉴》，当

中是否有借古讽今？而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评价中，以及节录柳宗元的两篇传记散文《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除了是想要赞扬柳宗元“善为文”以外，是否还有借助了柳宗元的这两篇文章去批评了与其政见不合的王安石？这些问题都会在此章节中进行探讨和分析。

第四节：研究难题/预计成果

本文所设定的目标是为了探讨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文学与政治评价中，是否会体现出他们本身对“熙宁变法”的看法与态度。并且，本文也将会论析和证明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评价中，是有意地借助了以评价之名，而实际上是讽刺了与政见不合的对方。因此，笔者将会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所写过的文章和著作再与他们对柳宗元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史事与文学作为一个相互论证，并且再加以分析与探讨。

第二章：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

王安石对柳宗元的评价虽然不多，但足以见得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是在北宋间难得的正面评价。王安石评过柳宗元的作品分别是《上人书》与《读〈柳宗元传〉》。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赞扬了柳宗元的文学，称其为文章的“豪杰可畏者也”，肯定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而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则是表达在《读〈柳宗元传〉》中。北宋期间大部分的文人与史家都受到史书的影响，因此对“顺宗新政”都是保持着贬斥的态度。他们会将“顺宗新政”的事件与参与的“二王八司马”一起评价，也就是说他们在批评“顺宗新政”或是王叔文时，其实也是同时在批评着有份参与的“八司马”，也就是柳宗元等人。然而，王安石虽然没有像北宋文人范仲淹（989-1052）那样肯定了柳宗元所参与的“顺宗新政”这项政治改革，但他却在其文《读〈柳宗元传〉》中称赞了柳宗元等人为奇才，同时也在其文中反射出王安石本人积极有为的改革精神。

第一节：“天下之奇才也”

宋人对柳宗元所参与的“顺宗新政”大多都表达出批评与责难，他们对其政治的评价焦点基于“顺宗新政”事件¹，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延续了在中晚唐五代时对“顺宗新政”保持贬斥的观点。如由宋人宋祁（998-1061）及欧阳修（1007-1072）等人所编著的《新唐书》延续了中、晚唐五代时的观点，对王叔文的指责更为尖刻：“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货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异。”²《新唐书》对王叔文的指责，其实同时也对于柳宗元在政治上的“污点”更加详细地描写。欧阳修在他修撰的《新唐书》中除了批判王叔文是“小人”之外，同时连同柳

¹ 莫道才，《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广西：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页8。

²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十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68，页5143。

宗元等“八司马”也大肆批评：“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³认为柳宗元等人跟随着、顺从着王叔文为了一己私利而玩弄权力，对他的政治品格进行了严格尖刻的指责。并且在目录的分配中，《旧唐书·柳宗元传》是与韩愈、李翱等等的文人并排在一起，但到了宋代欧阳修等人所编的《新唐书》，当中的“柳宗元传”却被安排到了与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等几位参与过“顺宗新政”的文人，不仅将韩、柳分开，还将柳宗元与“二王八司马”等人并排在一起，故此能够看出到了宋代，史书对柳宗元的评价是更加的贬低。可见，在当时大部分的文人都将王叔文与其党羽都是“一致”的，即柳宗元参与了“顺宗新政”，那便与王叔文、王伾一般，政治品格也是恶劣的。

当中，苏轼对柳宗元的批评更是直接和毫不留情，如《柳子厚诞妄》中“柳宗元敢为诞妄，居之不疑。”⁴、《与江惇礼五首》中更是直接道柳宗元“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⁵而在其《柳子厚论伊尹》中对柳宗元的批评更是苛刻直接：

“元佑八年，读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妄，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其有意欲教诲桀而全其国耶？……宗元意欲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⁶

《伊尹五就桀赞》是柳宗元的一篇散文作品，伊尹是一位政治家，因为对商汤和夏桀之间多次往复，商汤是一位有仁德的明君，而夏桀的却非常残暴，既然夏桀如此的德性，那为何伊尹还会五次投靠夏桀，并且多次在两国之间往返呢？因此面对其他人的质疑，柳宗元却认为“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⁷因为伊尹心系百姓，就算夏桀不仁德，若他去投靠夏桀，那百姓便能受到恩惠，可见伊尹非常爱民，为了百姓竟不顾自己的安危投靠夏桀。然，苏轼却认为“宗元意欲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⁸苏轼认为柳宗元是在把伊尹比喻成自己，而夏桀是比喻成王叔文、王伾，商汤则是唐德宗，因此苏轼认为柳宗元之所以会说伊尹是圣人，是为了爱民心切才会五次投靠夏桀，就如柳宗元自己也是为了爱民爱国才会

³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十六册）》，卷168，页5143。

⁴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65，页2037。

⁵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四册）》，卷56，页1703。

⁶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四册）》，卷65，页2036。

⁷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卷19，页1314。

⁸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四册）》，卷65，页2036。

加入“顺宗新政”一样。因此苏轼批评柳宗元写此文只不过是想要为了自己的“罪行”而自我辩解罢了。可见，苏轼不仅对“顺宗新政”保持着批评的态度，他甚至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也是十分厌恶。

因此，在宋人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上进行批评时，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有另一番的见解。王安石赞扬了柳宗元等八司马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其散文《读〈柳宗元传〉》中写道：“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⁹王安石对柳宗元等人称之为“天下之奇材也”，肯定了他们的政治才能，并且还赞扬了他们就算被贬谪和经历了磨难后，依旧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因此他们名留青史。柳宗元虽然遭受贬谪，其在官场上不得志，但他的文学作品却备受赞扬，尤其是他在贬谪时期的作品，更是受到了当世与后世人的肯定与赞赏，就连贬斥他政治品格的苏轼也肯定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柳宗元自贬官后也没有气馁，他把经历都放在著书和写文上：“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颺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¹⁰虽其谦虚表示自己“薄才”，然可见他将精力都放在著书上。就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¹¹韩愈认为柳宗元的情况“福祸相依”，倘若当初柳宗元重回官场，那他未必能达到如今那么高的文学成就。因此，王安石欣赏柳宗元自强不息的精神，虽然遭受贬谪却没有自暴自弃，反而用心专研写诗文，让他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柳宗元这种不气馁的精神是被王安石所赞赏的。

另，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与才华是赞扬的，而且是有意识地将“二王”与“八司马”分开评价，这种看法有别于北宋时期大部分文人对柳宗元政治品格的批评和贬斥。但王安石还是受到史书的影响，认为柳宗元等人都是“一为叔文所诱，遂陷入于不义。”¹²认为柳宗元等人是受到了王叔文的诱惑，才会导致他们“误入歧途”，最终导致他们牵连被贬谪，但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将柳宗元等人与王叔文混为

⁹ 【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756。

¹⁰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卷30，页1957。

¹¹ 【唐】韩愈撰，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四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2393。

¹² 【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页756。

一谈，还赞扬了柳宗元等人的政治才华，同时也体现出王安石对柳宗元等人因为被王叔文“诱骗”受到牵连，导致柳宗元等人没办法在政治上发挥他们的本领而感到怜惜。贞元时期，唐朝自经过了“安史之乱”后恢复不了当初的“盛唐”之势，外有藩镇，内有宦官当权，若情况持续下去，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回忆起以往的“顺宗新政”，动之以情，句句哀怨，自称“罪人”，道出自己的不得志。文中虽道自己“过不自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¹³，但却说自己当初加入“顺宗新政”都是为了要做出对社会、百姓有利的贡献：“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¹⁴而章士钊则认为“乃子厚毕生学问与志愿所在”¹⁵，此是柳宗元一生的政治理想与梦想。可见柳宗元当初加入“顺宗新政”的初衷是为了国家与百姓得益，而不是为了功名。

其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道：“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其诟，犹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¹⁶柳宗元认为自己遭受冤枉谩骂却无从反驳，即使反驳澄清也无人愿意相信，可见柳宗元认为自己当初加入“顺宗新政”是为民为国，到了如今却无从辩驳，怎么说也说不清，而当时的人也没有明辨是非，只顾着对他诽谤谩骂，然柳宗元认为自己“秉志遵分”，坚守自己的志向，总有一天历史会还他一个清白。显然，柳宗元即使已经身处落魄也依旧是在坚持着自己的志向。因此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赞扬柳宗元“天下之奇才”以及还批评了攻击柳宗元所谓的“君子”：“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别于小人者耳？复何议于彼哉？”¹⁷王安石认为那些随波逐流评击柳宗元等人的“君子”却像是“小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柳宗元等人呢。这句话除了是讽刺那些反对新法的官员之外，同时折射着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与他积极有为的变法精神有深刻关联。¹⁸

¹³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卷 30，页 1956。

¹⁴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卷 30，页 1956。

¹⁵ 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页 679。

¹⁶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卷 30，页 1957。

¹⁷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756。

¹⁸ 杨碧海，〈宋代对刘禹锡的政治评价及其文化背景〉，《许昌学院学报》2016 年第 3 期，页 95。

第二节：王安石坚持不懈的改革精神

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赞扬了柳宗元“天下之奇才也”，肯定了柳宗元的政治才能以及他遭受贬谪却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且还嘲讽了那些对理想有始无终，与世俯仰的“君子”，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去议论或批评自强不息的“八司马”。从王安石的这段评击中，可看出王安石对那些随波逐流，没有坚持自己理想的人感到不满，并且十分欣赏柳宗元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从王安石对柳宗元的评价中也可以体现出王安石自己本身也拥有着对理想、坚持不懈的改革精神。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被宋神宗任为参知政事，虽是副宰相，但权力和职权上都不亚于宰相。再加上王安石深得宋神宗信任，故在事实上，其职权远远比任宰相的富弼重要。¹⁹宋神宗召王安石至京师后，便向宋神宗提出自己的托古改制的改革思想和方案：“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²⁰王安石希望能透过效仿尧舜的政法“立法度”能达到“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²¹当时北宋积贫积弱，国库空虚，王安石主张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让国家达到富民、富国、强兵的效果。王安石深知若一个国家若持续积贫积弱，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其在嘉佑四年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到：“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²²同年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随后便着手推动改革——“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陆续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等新法。王安石对新法很有信心，并且还在开始推行新法时写下了一首名为《元日》的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²³以描写农历初一喜迎佳节的情景表达出自己实行改革时的欢快心情，诗中又表现了新的事物必然代替

¹⁹ 张祥浩，魏福明 著，《王安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 107。

²⁰ 【元】脱脱 等撰，《宋史（第三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 327，页 10543。

²¹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410。

²²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416。

²³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308。

旧的事物这一规律²⁴，可见王安石对新法的信心以及将其推行的愉悦。然而，新法的推行却遭受了许多的非议与批评。

在熙宁变法中，王安石所遇到的反对派阵势是强大的，他们都是一些资深的重臣元老²⁵，当中包括反对派之首司马光、韩琦、富弼、吕公著、吕海等等，这些朝臣都对新法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如在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御史中丞吕海写《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中批评王安石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扰乱政体。而御史中丞吕公著也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不正言不顺”²⁶，赵抃则认为“强辩自用，动辄忿争，以天下之公论，为流俗之浮议，顺非文过，违众罔民。”²⁷而后来实行的青苗法，也遭受了许多官员的批评和非议，毕仲游道青苗法：“名为厚民，实乃剥下；名为惠民，实有利心。”²⁸而接下来所推行的新法也都遭受了批评和谩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道：“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²⁹可见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上至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有反对和批评声。

然，纵使王安石面对着排山倒海的批评声，他却依旧坚持着自己对改革的立场和态度。其秉持着“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坚持着改革的立场，并且道：“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³⁰自己已经预料到会有如此多的批评声，但他依旧没有退缩，持续推行新法，体现出他坚定和积极的政治理想与态度。如其诗中道：“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无病。……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善恶由吾身。”³¹王安石认为一个人的善恶是在于自己本身做了什么，而不是别人怎么批评这个人，因此即使“众人”对新法议论纷纷，又或是反对批评，王安石认为新法是能够让国家进步的，能够帮助百姓的，那便不需理会那些批评声音。因此，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

²⁴ 高克勤 撰，《王安石诗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 148。

²⁵ 张祥浩，魏福明 著，《王安石评传》，页 286。

²⁶ 【宋】李焘 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 210，页 5096。

²⁷ 【宋】李焘 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 210，页 5101。

²⁸ 【宋】毕仲游 著，【清】纪昀等 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十一·西台集（第一一二三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 5，页 52。

²⁹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页 1256。

³⁰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773。

³¹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216。

虽然不认同“顺宗新政”，却同情柳宗元对改革的热情和怜惜他的政治才能，但却因为被王叔文等人的诱惑和陷害而“误入歧途”，以至于让他被贬谪，无法再在朝堂中发挥其政治本领，并还提出：“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³²的观点。可见王安石在评价柳宗元的同时，也是在阐述着自己对理想坚持的态度，因此才会嘲讽了那些“与世俯仰的小人”，认为他们随波逐流，毫无原则，对自己的理想有始无终，体现出王安石赞扬了柳宗元等人对理想的坚持和坚定，同时也体现出王安石自己本身也是坚持自己政治理想之人，有别于那些随波逐流的小人。

³² 【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页756。

第三章：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

关于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评价，在司马光撰写的史书——《资治通鉴》中能够找到一二，分别是《资治通鉴·唐纪·贞元元年》中大篇幅地描述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以及“顺宗新政”事件的始末。司马光将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称为“王叔文党”，并且详细地列出了他们在朝中所为，道出他们在朝中的狂妄自大，为所欲为。而柳宗元身为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中一人，甚至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因此可以得知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是批评的态度。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记载了柳宗元为刘禹锡求情一事，并且还节录了柳宗元早期在长安任职的两篇传记散文，分别是《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并赞扬柳宗元“善为文”，以及在最后道：“此其文之有理者也。”³³可见司马光虽然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评价是批评的态度。

第一节：“王叔文党”

柳宗元身为顺宗新政，“二王八司马”的其中一员，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评价是延续了《新唐书》欧阳修、宋祁的观点³⁴，也就是保持着批判的态度。欧阳修在他修撰的《新唐书》中批判王叔文是“小人”，连同柳宗元等“八司马”也大肆批评：“宗元等桀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³⁵认为柳宗元等人跟随着、顺从着王叔文为了一己私利而玩弄权力，对他的政治品格进行了严格尖刻的指责。并且，《新唐书·柳宗元传》中收录了柳宗元在贬谪时期带有悔过之意的文章，如《寄许京兆孟容书》中道：“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

³³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 7934。

³⁴ 莫道才，《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页 10。

³⁵ 【宋】欧阳修，宋祁 撰，《新唐书（第十六册）》，卷 168，页 5143。

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³⁶、《萧翰林佚书》则道：“与罪人交十年，官以是进，辱在附会。”³⁷当中所提及的“罪人”便是王叔文。可见《新唐书》有意从柳宗元等人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悔过意出发，对顺宗新政及柳宗元在其中展现的才干给予诋毁³⁸，想要带出既然参与其中的人物都已悔不当初，那顺宗新政便是一个错误的意思。

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永贞元年》中详细地记载了“顺宗新政”的始末，而提到柳宗元的部分有四句，分别是“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³⁹和“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⁴⁰以及介绍了“顺宗新政”失败后“二王八司马”的下场，当中也记载了柳宗元也遭受贬谪后的官职，分别是永贞元年（805）九月被贬为“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⁴¹以及十一月再贬为“柳宗元为永州司马……”⁴²。“顺宗新政”的初衷是一场政治改革行动，中唐时期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已恢复不了盛唐气象，再加上藩镇与宦官内忧外患的现象，当时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辅佐中风失语李诵继位，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朝纲的改革措施。然而这一项政治改革只维持了一百余天，最终在同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后便夭折，而参与“顺宗新政”的王叔文集团的官员无一豁免，要么被监禁，要么被贬谪，这便是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司马光是对“顺宗新政”保持着批评的态度，因此不难发现在其编撰的《资治通鉴》中，“顺宗新政”对司马光来说并不是一场政治改革，而是王叔文与王伾为首的一场政治“乱政”，他们“挟持”已经失语的唐顺宗试图将权力玩弄在手掌中。

司马光将参与“顺宗新政”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的官员称之为“王叔文党”，因此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是基于“顺宗新政”事件中。⁴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王叔文等人称为“王叔文党”，将他们视为“一体”，而柳宗元也是“王

³⁶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卷 30，页 1956。

³⁷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卷 30，页 1998。

³⁸ 莫道才，《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页 8。

³⁹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 7824。

⁴⁰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 7831。

⁴¹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 7844。

⁴²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 7844。

⁴³ 莫道才，《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页 8。

叔文党”的其中一员，因此司马光所指的“王叔文党”中也包括了柳宗元。司马光对王叔文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如“叔文谲诡多计”⁴⁴《资治通鉴》中更是详细地列出了王叔文等人不少的“野心”，来对他们进行了批评：“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已用事于中，与相唱和。”⁴⁵、“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籍希朝老将，使主其名，而实以泰专其事。”⁴⁶、“先是叔文与其党谋，得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⁴⁷司马光也记载了朝廷对王叔文党的嫌弃与厌恶：“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兴专恣，上亦恶之。”⁴⁸、“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⁴⁹可见司马光对王叔文集团以及柳宗元政治品格的态度。

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永贞元年》中记载了王叔文集团的官员：“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⁵⁰的名字，并称他们为“有名而求速进者”，即是指这些官员已经有了些名堂但依旧想要快速得到更多的功名成就。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称柳宗元：“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⁵¹韩愈对“顺宗新政”是处于批判的态度，因此他在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时，也不忘在其中写下对柳宗元的政治态度批评，也就是指柳宗元为了快速得到功名事业而加入王叔文集团。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前的官职包括礼部员外郎，执掌礼仪、祭享和贡举之政令，无可否认的是，柳宗元获取这些官职很大的原因是来自王叔文与王伾的“荐举”。可见司马光是认同韩愈这个观点的。

再者，司马光也记录了王叔文集团互相勾结的情况：

“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意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

⁴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823。

⁴⁵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829。

⁴⁶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836。

⁴⁷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834。

⁴⁸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840。

⁴⁹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835。

⁵⁰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823。

⁵¹ 【唐】韩愈撰，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四册）》，页2392。

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憊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⁵²

上文讲述了王叔文集团在行政管理不符合规矩，居然通过宦官李忠言，甚至是后宫宠妃牛昭容传达御令和朝政，并且还描述了他们的狂妄自大，认为他们好功近利、目无法纪、为所欲为，就连士大夫们都对他们敬而远之，惧怕他们。而当中所提及柳宗元“主采听外事”，凸显出了柳宗元在王叔文集团中是身为骨干地位。柳宗元在《上河阳乌尚书启》中道：“小子久以文字进身，尝好古人事业，专当具笔札，拂缣缃，赞扬大功，垂之不朽。”⁵³回忆自己当初是因为善于写文而进入仕途，因此其在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中所扮演之角色可以推测是负责起草诏命制诰的人，而这些草诏在当时王叔文集团与朝中政治势力的角力中起着关键作用，与政令、人事等重要决策有莫大的利害关系。⁵⁴所以柳宗元才会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道：“宗元於众党人中，罪状最甚。”⁵⁵以柳宗元在“顺宗新政”中的职责，除了是负责起草诏命制诰，也许还包括了写文章宣扬新政的改革，所以王叔文集团所涉及的政改与政事中他都会参与，因此他才自称为在众多的党羽中，他的罪状最甚。可见司马光是知晓柳宗元在当时的职务要领，于是将柳宗元的名讳与职责列了出来，在接下来苛刻的批评“汲汲如狂”、“憊然自得”、“惟其所欲”，自然而然的也是司马光对柳宗元政治品格的批评。

第二节：对柳宗元人品的赞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记载了“八司马”，当中也包括了柳宗元被贬谪后第十年的事迹，同时也节录了柳宗元的两篇传记散文，分别是《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并赞扬柳宗元“善为文”，随后还道“此其文之有理者也。”⁵⁶可见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文学才能是保持肯定的态度的，他并没有因为对柳宗元

⁵²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 7830。

⁵³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七册）》，卷 36，页 2306。

⁵⁴ 孙昌武 著，《柳宗元传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 74。

⁵⁵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卷 30，页 1956。

⁵⁶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 7934。

的政治品格保持着贬斥的态度而对柳宗元的文学才能带上“偏见”。因此，在《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司马光将柳宗元等人为被派去偏远的播州的刘禹锡求情，并且还记载了柳宗元的仗义言辞，愿意“舍身”自己去播州。可见司马光并没有对柳宗元的人品与政治品格混为一谈，而是将两者分开，虽然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是贬斥的，但他对柳宗元的人品却是赞扬的。

《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记载了柳宗元替刘禹锡求情一事：

“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⁵⁷

元和十年（815）是自柳宗元等人在“顺宗新政”失败后被贬谪的第十个年头，“八司马”等人从司马升为刺史，但都是被调派到一些偏远的地方，如柳宗元到柳州，刘禹锡到播州。然而播州非常偏僻，甚至比柳宗元所要到的柳州更偏僻一些，而刘禹锡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要照顾，因此柳宗元等人替刘禹锡求情。《旧唐书·柳宗元传》中记载柳宗元得知消息后道：“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⁵⁸随后甚至“即草奏章，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⁵⁹而《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具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⁶⁰而在柳宗元等人替刘禹锡请求后，唐宪宗也准许刘禹锡不必前往播州，而是“改禹锡连州刺史。”⁶¹在这段事件可以发现柳宗元是很重情义的，因为柳宗元本身也是和刘禹锡一样的“带罪之臣”，却不忍见刘禹锡到偏僻的播州无法照顾其老母亲，而欲起草奏章唐宪宗让自己“舍身”去播州。这样的举动固然让人动容，然却会有“犯上”之嫌，若稍有不慎，说不定还未到被调派之地，便会命丧黄泉。可见柳宗元此举十分勇敢，也非常有义气，因此司马光将这段事迹记载在《资治通鉴》中，可见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这项举动是嘉许和赞扬的。

⁵⁷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933。

⁵⁸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十三册）》，页4214。

⁵⁹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十三册）》，页4214。

⁶⁰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933。

⁶¹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933。

司马光将柳宗元为刘禹锡求情一事记载后，还节录了柳宗元的《梓人传》与《种树郭橐驼传》，然，柳宗元到了柳州后的政绩却未有记载。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政绩在《旧唐书·柳宗元传》及《新唐书·柳宗元传》中均有记载：“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以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⁶²、“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⁶³柳州的人有一个习俗，“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⁶⁴穷人家将自己的孩子作为抵押，把孩子们交给债主，若时间到了借钱的人没有还钱，那孩子们就会沦落作为债主的奴婢，不能再赎回。这样的习俗会导致那些借钱的穷人家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们也失去了自己的家人，永远成为奴婢，再也没有出路。因此，柳宗元就想办法想要改善这个习俗，替借钱的人都赎回他们的孩子。“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⁶⁵柳宗元让债主记下孩子们当佣人的工钱，直到孩子们的工钱足够抵消其父母借的钱时，孩子们就能够自由，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这种方法不但让债主和借钱的人都收获利益，两全其美，所以证明柳宗元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后来观察使见这个方法有效，便推广到其他的州县，到了一年之后，“免而归者且千人”。⁶⁶这可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柳州的孩子不会再因为父母的借钱而失去了自己终身的自由，债主也不会因为收不回借出去的钱而亏损自己的利益，造就了“州人顺赖”，对柳宗元很是敬佩。这样一桩“美谈”都被记载在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亦有记录此事。

然而，司马光却未将此事迹记载进《资治通鉴》中。笔者认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任何有关柳宗元的政绩，是因为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倾向是保持着批评的态度。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品格是批评的，但他却没有将柳宗元的政治品格与人品混为一谈，他在《资治通鉴·唐纪·永贞元年》中对“王叔文党”中的柳宗元进行了苛刻的批评，然，《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却将柳宗元为刘禹锡求情一事记载。司马光批评柳宗元的政治品格，但却没有否定柳宗元的道德人品，其实两者并不冲突，就像韩愈对“顺宗新政”也是保持着批评的态度，但他在《柳子厚

⁶²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十三册）》，页4214。

⁶³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十六册）》，页5132。

⁶⁴ 【唐】韩愈撰，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四册）》，页2391。

⁶⁵ 【唐】韩愈撰，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四册）》，页2391。

⁶⁶ 【唐】韩愈撰，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四册）》，页2391。

墓志铭》中却赞扬和肯定了柳宗元的人品：“士穷乃见节义。”⁶⁷ 政治倾向与人的觉悟有关，故觉悟从属于政治，人格操守却是一种品质，它从属于道德。⁶⁸ 故此，司马光对柳宗元人品的赞赏，是其独特的见解，其并未因为对柳宗元政治品格和政治倾向的批评态度而对柳宗元的人品作出质疑，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可见司马光对柳宗元的人品是赞扬的，所以将柳宗元为刘禹锡求情、“舍身”前往播州一事记载在《资治通鉴》中以作对柳宗元此举的表扬。

⁶⁷ 【唐】韩愈撰，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四册）》，页2391。

⁶⁸ 宋志坚，〈《资治通鉴》中的柳宗元〉，《福建日报》，2020年7月19日，第三版（武夷山下）。

第四章：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交锋”

王安石与司马光本来是昔日的“嘉佑四友”，然而自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因为二人的政见不合，王安石坚持执行新法，而司马光则坚持反对新法，因此二人在政治的道路上逐渐形同陌路。王安石在其文章《读〈柳宗元传〉》中，他赞扬了柳宗元等人“奇才”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肯定了他们的政治才能。同时，王安石除了是替柳宗元抱不平之外，其实也是想要借鉴柳宗元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遭遇，讽刺那些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思考就反对新法的人们，当中就包括了对反对派之首——司马光的批评。而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法保持着批评的态度，他对新法的态度也经常会反映在其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因此司马光将柳宗元的两篇传记散文《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都节录在《资治通鉴》中，除了是赞扬柳宗元“善为文”，同时也是想要借古讽今，批评王安石身居宰相却不懂为相之道，而以爱民之心推行的新法实则上也是在“扰民”。

第一节：王安石讽刺司马光“与世俯仰之小人”

王安石在其文章《读〈柳宗元传〉》中，他赞扬了柳宗元等人“奇才”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肯定了他们的政治才能，以及批评了那些攻击柳宗元的人，并且认为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地跟着批评声浪，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同时，王安石除了是替柳宗元抱不平之外，其实也是想要借鉴柳宗元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遭遇，讽刺那些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思考就反对新法的人们。故此，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除了是赞扬柳宗元等人，其实也体现出他“人言不足恤”，坚持自己推崇革新新法的立场以及评击那些反对新法的“流俗”之人，当中就包括反对派之首——司马光。

虽然因为推行新法，王安石便面对了无数的批评声浪和遭受和许多非议，然而王安石甚少一一回应外界的质疑声，把心思和精力都专注在新法改革上，就如“三不

足”中的“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的“三不足”是指“天变不畏惧”、“祖宗不足法”以及“人言不足恤”，这三个观点是王安石政治伦理价值理念的基础，也是构建了王安石所要的“富国强兵养民”社会的价值基石。⁶⁹“三不足”之说最早由司马光所记载：“熙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时王介甫言于上，以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质于所试者。范景仁后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为策目矣。”遂删之。明日，禁中以纸帖其上，别出策目试清臣等。”⁷⁰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将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纳入试题中，其的用意便是要应试者再对策时对“三不足”之说加以批判⁷¹，可见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是持着反对和批判的态度，甚至试图以“三不足”之说让王安石陷入更大的一个风波中。而宋神宗在问王安石是否有说过“三不足”之说时，王安石却回答：“不闻。”⁷²但既然王安石否认了“三不足”是他自己提出的说法，但为什么后世却一致认为“三不足”就是王安石本身的政治理念呢？现代学者邓广铭认为，若王安石不曾说过，司马光是撰造不出如此富有开创和革新意义的话语的，故此“三不足”之说为王安石亲口所说是绝无可疑的。⁷³并且也不难发现在王安石的文章和他的革新理论中都有着“三不足”的“影子”。

而“人言不足恤”，是指那些流俗之间、流俗之人的言论所说的。⁷⁴那什么才是流俗之言呢？王安石认为，保守派评击新法的言论、阻碍新法实施的闲言杂语，都是“流俗之言”。⁷⁵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道：“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⁷⁶、“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⁷⁷王安石知道自己所推崇的新法必定会遭受众人的争议以及反对，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熙宁变法”的实行导致了北宋间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争斗，与王安石在同一时期的司马光也就是与革新派的王安石站在对立面的反对派，他曾经为了要阻止王安石新法持续推

⁶⁹ 高梦琪，《王安石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武汉：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页24。

⁷⁰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一册）》，页678。

⁷¹ 李昌宪著，《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75。

⁷² 刘成国著，《王安石年谱长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页1046。

⁷³ 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92。

⁷⁴ 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页103。

⁷⁵ 高梦琪，《王安石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页26。

⁷⁶ 【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页422。

⁷⁷ 【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页422。

行下去，三书王安石，软硬兼施，希望能成功劝阻王安石。除了司马光，还有苏轼、富弼等等，都曾经因为熙宁变法而批评过王安石。但王安石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新法，不为所动，故此“人言不足恤”。

因此，王安石在其散文《读〈柳宗元传〉》中除了是替柳宗元说句“公道话”之外，同时也有意要借鉴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用于对自己的政治观点有所发挥，并且讽刺那些反对新法的“流俗”之人。王安石自熙宁元年（1069）年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陆续推出新法后，引起了无数的争议，朝堂上的官员也对王安石作出了无数的批评与讽刺，因此朝堂逐渐分裂成两个党派，一个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新法派，而另一派则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苏轼就曾对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时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有过批评：“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发新奇，吏皆惶惑。”⁷⁸认为王安石的新法看似宏大和新奇，但实际上只会造成官员和人民的疑惑以及惊恐，故此他也是持续反对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另，司马光也对“熙宁变法”保持着反对和贬斥的态度，他曾批评过王安石“卿之私谋”，又上了《奏弹王安石表》对宋神宗弹劾王安石，尽了自己所能阻止新法继续推行。然而，宋神宗重任王安石，并且大力推行新法，纵然司马光再如何反对批评，似乎也没办法让宋神宗与王安石改变想法，终止新法。于是，司马光在熙宁三年（1071）作《与王介甫书》，全文动之以情，希望以昔日同僚之情能够成功让王安石罢新法。在文中司马光赞扬王安石“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⁷⁹又指自己其实很敬仰王安石“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⁸⁰然，在随后司马光缓缓指出新法弊端，指责王安石自信太厚而拒谏、向人民征利“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⁸¹、扰民“纷纷扰扰，莫安其居”⁸²等等。

而王安石也在熙宁三年（1071）写了一篇《答司马谏议书》驳斥了司马光的指责，全文不过四百字，一则说明任何一个人改革变动都会有人反对的道理；二则以盘

⁷⁸ 【宋】苏轼 著，孔凡礼 点校，《苏轼文集（第二册）》，卷 25，页 729。

⁷⁹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 1256。

⁸⁰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 1257。

⁸¹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 1256。

⁸²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 1260。

庚的不动摇说明自己坚持变法革新的立场和态度。⁸³王安石以司马光所举出的主要的四个质疑作出回复，那便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⁸⁴王安石道：

“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⁸⁵

王安石一一反驳了司马光举出的四个质疑，他认为官吏都是得到皇上的受命而执行，便不算侵夺官权；利用先王的政策为除社会弊端，便不算生事；为天下理财，便不算与百姓征利；反驳不正确的言论，便不算是不听他人规劝。当中的“壬人”是指奸佞之人，可见当中也有讽刺司马光之意。并且还举出了“盘庚迁都”历史事件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犹如盘庚被百姓埋怨，但自己的新法推行都是为了百姓好，并且王安石对社会上对他的埋怨也早就预料到了，“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⁸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凭着其“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坚持着自己改革的立场。

因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除了表明坚定自己对于改革的立场，同时也谴责了当时士大夫的苟且之风：“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⁸⁷王安石认为当时朝廷的情况都已经习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故此他坚持自己的改革立场，表明了自己不同流俗、不畏人议的无畏精神和倔强性格。⁸⁸司马光身为反对派领袖，可见王安石在此字句中也有对其进行了评击与讽刺。而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除了赞扬柳宗元等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外，同时还因为柳宗元的政治遭遇以及所面对的批评而联想到自己，并且也联想到那些随波逐流、安于现状而反对改革的“君子”。其在《读〈柳宗元传〉》中道：“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别于小人者耳？复何议于彼哉？”⁸⁹王安石贬斥那些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就随波逐流批评柳宗元等人的士大夫，与那些与世俯仰的“小人”没有分别。而王安石在执行

⁸³ 曲德来 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 广选 新注 集评》（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页 221。

⁸⁴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 1256。

⁸⁵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773。

⁸⁶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773。

⁸⁷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773。

⁸⁸ 高克勤 撰，《王安石诗文选评》，页 147。

⁸⁹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页 756。

改革的时候，也是遭受反对派与众人的反对与质疑，王安石即使遭受多方面的围攻，但依旧不妥协并坚持实行变法，实现他“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司马光身为反对派之首，对王安石新法保持着排斥和批评的态度，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如此批评士大夫的“苟且偷安”，在《读〈柳宗元传〉》中批评“与世俯仰的小人”，可见王安石也是凭此对司马光进行讽刺。

第二节：司马光讽刺王安石“扰民”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元和十年》中记载了柳宗元的两篇传记散文，分别是《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并且道柳宗元“善为文”，还有认为柳宗元的两篇散文“此其文之有理者也。”⁹⁰可见司马光不仅对柳宗元的文学是保持赞扬的态度，更是体现出司马光对《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也表示认同，因此才会载入《资治通鉴》中。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中注释道：“《梓人传》以喻相，《种树传》以喻守令，故温公取之，以其有资于治道也。”⁹¹而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道：“胡三省作《注》，谓《梓人传》论相业，以其有资于治道，故温公取之，身之热精故事，自了解温公心理。”⁹²《资治通鉴》除了是载史，司马光还会采取借古讽今、以史事作为一个借鉴让后世学习与反省，那样会有利于治国之道。

司马光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与《梓人传》节录在《资治通鉴》中，也必然有他的道理。《种树郭橐驼传》借着郭橐驼养树带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⁹³的养民之道；《梓人传》则是借着梓人有优秀的领导能力带出当宰相之道。然而这两篇散文虽然全篇没有着重批评，实际上都是以讥讽的方式去批评了朝廷的一些问题，比如《种树郭橐驼传》是讥讽统治者政令烦苛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⁹⁴，而《梓人传》则

⁹⁰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934。

⁹¹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页7935。

⁹² 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页427。

⁹³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四册）》，卷17，页1172。

⁹⁴ 刘国盈，〈读《种树郭橐驼传》〉，《学习与研究》1985年03期，页48。

是批评居相位却不谋宰相之政的庸人。⁹⁵因此，司马光将柳宗元的这两篇传记散文节录在《资治通鉴》中，除了是想要赞扬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和其文章以外，其实司马光是想要借着评价柳宗元作品，以讽刺与他政见不合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陆续推动一系列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然，此变法虽得到宋神宗看重并且推行，但却遭到朝廷上很多官员的反对，其中有苏轼、欧阳修等人，当中当然包括司马光。司马光曾指出新法的六大弊病：“一曰广散青苗使民负责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役斂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六曰信狂狷之人妄兴水利，劳农费财。”⁹⁶短短六句话便道出了他对新法的看法与立场，指出了“熙宁变法”的弊端。司马光对罢免新法的态度非常坚决，为了成功罢免新法曾上书弹劾王安石，甚至将“三不足”之说让王安石陷入政治风波中，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却不曾动摇。

因此，司马光认为王安石“自信太厚”，为达到他自身变法的成果不顾民意看法，甚至不顾民意擅自“变更祖宗旧法”，让百姓混淆，让原有完整的体制被王安石“搅乱”得不成样子。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无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废也？”⁹⁷随后又举出例子：“汉武帝用张汤之言，多改旧法，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⁹⁸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然他并不是完全反对改革，他曾也认为“因循旧贯，更成大弊”，司马光是认为要在改革的前提是遵从“先王之法”，主张积极地因循先王的善法，对现存制度主张扬长避短，反对大规模地推陈布新⁹⁹，其在《与王介甫第三书》中道：“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¹⁰⁰体现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新法的立场。

⁹⁵ 宋绪连 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 广选 新注 集评 柳宗元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页128。

⁹⁶ 【清】毕沅 著，《续资治通鉴（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70，页1753。

⁹⁷ 【清】黄以周等 辑注，顾吉辰 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6，页259。

⁹⁸ 【清】黄以周等 辑注，顾吉辰 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6，页259。

⁹⁹ 李向伟，刘双，〈也谈司马光和王安石变法〉，《驻马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页72。

¹⁰⁰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1265。

另，司马光在《奏弹王安石表》中弹劾王安石：“朋党鳞集，亲旧星攒，式备进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¹⁰¹认为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并不是用贤用才，而是任用一些自己满意的人，这样的任用人方式在司马光看来是王安石要组建朋党政治。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提拔了一大批支持新法的官员，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皆越级擢升，后来都位居宰相。¹⁰²司马光对此非常不满，并且多次对王安石进行和嘲讽与批评，如其认为王安石“自信太厚”，嘲讽王安石“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¹⁰³认为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是过于自我，纯粹以个人好恶擢拔官吏，即使有再好的政治措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反而会让贪图名利的小人有机可乘。

因此，司马光将柳宗元的《梓人传》节录在《资治通鉴》中除了是赞同柳宗元所提出的为相之道，将其中的道理记载在其中让后人用于治道以外，同时也是为了讽刺王安石没有“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¹⁰⁴。柳宗元提出“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¹⁰⁵的“择人”观点，认为官职的选拔应当以才能为主，能者进不能者退，让天下之士能各凭本事获得官职，摆脱那些形形色色的“关系网”，这样一来大家便能在适合自己官职上完全发挥自己的本领，为国家效力。然，在司马光看来当时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¹⁰⁶，以个人的好恶去选拔官吏，而不是凭官吏的本身与才能是否适合他们的职务。这样以“靠关系”而获得官职的官吏是没办法完全发挥他们的本领的，长久时间下来甚至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因此，司马光除了在书信、文章等中对王安石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讽刺，他甚至还将柳宗元带有讽刺奸相的传记散文《梓人传》节录在《资治通鉴》中，讽刺和批评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而用人不当，甚至是因为过于自信和固执“炫能矜名，……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¹⁰⁷司马光认为王安石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没有远见，讽刺王安石身居相位却不能承担此责任。

¹⁰¹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1650。

¹⁰² 王德保著，《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114。

¹⁰³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1255。

¹⁰⁴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四册）》，卷17，页1189。

¹⁰⁵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四册）》，卷17，页1189。

¹⁰⁶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1255。

¹⁰⁷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四册）》，卷17，页1189。

另，司马光对理财的观念是“节流”，对养民的态度是“安民”，他在《上体要疏》中提出“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¹⁰⁸ 司马光的民本思想是主张体恤人民，主张“仁政”，其在《与王介甫书》道：“自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通责也。”¹⁰⁹ 认为对百姓轻徭薄赋便是最好的养民方法。与王安石的观点“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¹¹⁰ 注定对立。熙宁二年（1069）九月正式颁行的青苗法遭到群臣的反对，而司马光亦是极力反对青苗法。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改革平仓法，增加国家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然，青苗法实际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司马光在九月二十日向宋神宗呈上的《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道出了青苗法的弊端：“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¹¹¹ 司马光认为青苗法随户等抑配，又令贫富相兼，编为保甲，一有歉收，贫户二税尚且无法缴纳，更不要说偿还青苗利息了，春债未毕，秋债复来¹¹²，这样一来无论是富户还是贫户，债务只会越来越重，无法获利。因此，比起青苗法，司马光更推崇之前的平仓法，“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公私俱利，法之至善者乎。”¹¹³ 认为平仓法能够确保社会的稳定性。并且，倘若将青苗钱大幅度散放，只怕会导致原本已经空虚的国库雪上加霜，倘若遇上灾害，国库不但无法自给自足，更无法调用钱粮赈灾黎民百姓。

因此，司马光为了阻止新法推行，除了向宋神宗弹劾王安石，甚至还“三书”王安石，希望王安石能“悬崖勒马”，撤掉新法。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借孟子所道的话对王安石进行批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¹¹⁴ 批评王安石只道“利”，而忽略百姓之苦，对百姓进行剥削压榨。故此，青苗法固然能增加国家的收入，然而在司马光看来，当时的社会再加上新法的不完善，虽推行青苗法的初衷是“利民”，但实际上会给农民增加很重的负担，若此法长久同行，只怕日后的情况并不会好转，反而会引发许多问题。因此，司马光在《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中批

¹⁰⁸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二册）》，页897。

¹⁰⁹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1255。

¹¹⁰ 【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页795。

¹¹¹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二册）》，页919。

¹¹² 李昌宪著，《司马光评传》，页166。

¹¹³ 舒大刚、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6043。

¹¹⁴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页1258。

评王安石与熙宁变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¹¹⁵虽然以爱国爱民为初衷，然而实际上却是变相压榨百姓。可见，司马光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节录在《资治通鉴》中，除了是赞扬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实际上司马光是想要借助《种树郭橐驼传》去批评王安石及其变法，虽然初衷是为国为民，然而却适得其反，过于求取成果而忽略百姓，就犹如《种树郭橐驼传》中的“他植者”，“爱之太殷，忧之太勤”而忽视了“顺木之天，以致天性”的养民之道，“爱民之心”反而成为了“扰民”。

¹¹⁵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二册）》，页987。

第五章：结语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曾对柳宗元的政治进行过评价。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赞扬了柳宗元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且还肯定了他的政治才能，认为他只不过是和王叔文等人所牵连，才会导致他也被贬谪，可见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是将柳宗元和王叔文分开，并不会因为柳宗元加入了“顺宗新政”而将他们一起评价。而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则与王安石不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并没有认为王叔文集团所进行的“顺宗新政”是一起改革运动，而是认为那只是王叔文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场“乱政”，他也将王叔文集团称为“王叔文党”，可见司马光对柳宗元的政治评价是批评的，因为柳宗元是属于“王叔文党”的其中一员。

综上所述，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有意借助了评价柳宗元之名，实际上是想对此批评与讽刺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对方。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讽刺了那些与世俯仰的小人，直指那些反对新法、“喜旧厌新”的反对派。王安石曾在《答手诏封还乞罢政事表札子》中指责司马光“流俗小人”，并且还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谴责了当时候士大夫的苟且之风，而司马光身为反对派之首，王安石这不就如同当面指责司马光“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吗？因此，可见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所指责和讽刺的“与世俯仰的小人”中，肯定包含了司马光。

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节录了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除了是想要赞扬柳宗元“善为文”，肯定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以外，同时也是想要借助柳宗元这两篇散文的中心思想讽刺王安石。《梓人传》以梓人的领导能力引申出为相之道，并且还有讽刺奸相之意，而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正是他为相时期，司马光便趁机节录《梓人传》，讽刺王安石没有理解为相之道，如没有做到让官吏“使称其职”，反而是因为自己个人喜好来拔擢官吏。而《种树郭橐驼传》则是以种树之道引申出养民之道，而文章中讽刺了“他植者”对树的骚扰导致树木没办法“顺天性”生长，因此司马光便是借助柳宗元这篇文章讽刺了王安石与其新法，虽以爱民之心推行新法，然而却适得其反，犹如“他植者”那般忽略了种树之道，爱民之心最终也成了“扰民”。

参考文献

古籍

1.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唐】柳宗元 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唐】韩愈 撰，屈守元，常思春 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5. 【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毕仲游 著，【清】纪昀等 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十一·西台集（第一一二三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7. 【宋】欧阳修，宋祁 撰，《新唐书（第十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9. 【宋】司马光 撰，李文泽、霞绍晖，《司马光集（第三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10. 【宋】司马光 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第二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 【宋】苏轼 著，孔凡礼 点校，《苏轼文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南宋】李焘 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 【元】脱脱 等撰，《宋史（第三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宋】王安石 撰，《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清】毕沅 著，《续资治通鉴（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
16. 【清】黄以周等 辑注，顾吉辰 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专书

1. 邓广铭 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 高克勤 撰，《王安石诗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李昌宪 著，《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曲德来 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 广选 新注 集评 王安石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5. 宋绪连 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 广选 新注 集评 柳宗元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6. 舒大刚、刘琳 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7. 孙昌武 著，《柳宗元传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
8. 王德保 著，《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 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10. 张祥浩，魏福明 著，《王安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期刊论文

1. 李向伟, 刘双, 〈也谈司马光和王安石变法〉, 《驻马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 页71-76。
2. 杨碧海, 〈宋代对刘禹锡的政治评价及其文化背景〉, 《许昌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页92-95。

硕士论文

1. 莫道才, 《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2. 高梦琪, 《王安石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报章

1. 宋志坚, 〈《资治通鉴》中的柳宗元〉, 《福建日报》, 2020年7月19日, 第三版(武夷山下)。